
全球城市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及上海的差距

——教育结构视角

【摘要】：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提供了机遇。全球城市的形成通常需要经历去工业化和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两个阶段。2003年上海市服务业占全市总就业的比例超过了工业行业，意味着迈出了向全球城市转型的第一步，但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却停滞不前，迟迟未能迈出转型的第二步。究其原因，上海常住人口（特别是外省市来沪人口）较低水平的教育结构是制约上海生产者服务业集聚和发展的主要阻力，低教育程度的人口资源不仅无法为上海经济的去工业化及生产者服务业集聚提供高素质劳动力，还使得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迟迟不能转型。对此的解决思路是：借助政府有形之手，运用外在的力量推动上海产业结构演进；提升外来人口的教育结构，为生产者服务业在上海的集聚以及上海向全球城市的转型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关键词】：全球城市，产业结构，教育结构

1 问题的提出

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及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的两次经济转型，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已发展为全球城市，以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影响和控制力也日趋上升。而2008年以来，受美国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军事危机影响，世界经济的重心正转向亚洲、转向中国，作为中国经济枢纽的上海，迎来了向全球城市转型的难得机遇，上海也制定了30年发展纲要，力争在未来30年跻身于全球城市之列。毋庸置疑，上海无论在服务业总量还是服务业结构，特别是人力资本密集的生产者服务业方面，与上述全球城市存在显著差距。本文拟以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形成过程中生产者服务业发展规律为参照，对上海与全球城市的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并从城市人口的教育结构视角分析差距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2 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全球城市”理论的研究源于“世界城市”理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丝奇雅·沙森教授认为，世界城市是具有全球性辐射功能的现代化大都市，研究重点侧重于城市本身；而全球城市是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研究重点偏重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作用。沙森教授对全球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进行了解释：全球城市是对全球经济具有中心控制功能的城市，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以及专业性的生产者服务业；全球城市是具有特定类型的信息中心功能的城市，高度专业化和网络化的服务部门构成了全球城市独特的生产优势；全球城市的控制性特征要求这些专业服务公司必须提供全球性服务^[1]。卡斯泰尔^[2]和马克亚伯拉·罕森^[3]等也强调全球城市的特征在于其城市网络的节点功能。

随着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向中国的转移，国内关于全球城市的研究文献也日益增多。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振华教授^[4]论证了处于全球城市网络中下段城市所发挥的作用。石光宇等^[5]研究了美国全球城市形成的原因并指出了对中国的启示。沈璐等^[6]通过比较世界城市群转型发展历程，对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的国际环境进行了分析。黄苏萍等^[7]通过分析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2030年产业规划，对上海的全球城市发展规划提出了有益的建议。邱灵等^[8]研究了全球城市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条件。张婷婷等^[9]研究了全球城市制造业企业布局及对上海的启示。都阳等^[10]研究了纽约等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相应阶段城市人口规模、产业分布与劳动力就业分布的特征。陆珉比^[11]、余佳^[12]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层级中的位置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上述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了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面临的机遇及挑战，但大多为城市发展战略、城市空间布局等宏观视角的研究，从微观经济层面进行的研究较少，更未有学者从人口教育结构视角对全球城市生产者服务业进行研究，笔者希望对此进行一次尝试。

3 全球城市形成过程中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纽约、伦敦、东京与上海的比较

全球城市是去工业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后工业化城市，全球城市形成过程中城市产业结构演变主要表现出两大规律：一是发达国家传统工业中心去工业化的规律，二是生产者服务业向这些后工业化城市集聚的规律。

3.1 去工业化在三大城市的表现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世界劳动分工从传统的国内生产、跨国贸易转为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市场一体化。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全球化生产组织，将产品的生产过程按价值链细化至不同环节，并将其分布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价值链分工中的高端环节——管理、服务等依然保留在发达国家，并集聚至发达国家的传统工业中心城市，使这些城市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

生产分散化和集中化导致了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根据其要素特征成为了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中下级城市，而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经历了去工业化过程并逐渐发展成全球城市网络中具有节点和控制功能的全球城市。

表 1 1977~1996 年纽约、伦敦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分布(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百分比)

	纽约			伦敦		
	1977	1985	1996	1977	1985	1996
制造业	21.9	15.4	9.0	22.0	16.0	8.4
第三产业	63.7	73.8	89.3	73.0	78.5	88.5
FIRE 部门	15.9	17.3	17.0	9.9	18.2	11.7

注：1)表中的纽约是指纽约城，包括纽约/曼哈顿、国王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和里士满区 5 个区；伦敦是指伦敦大都市，包括伦敦市和 32 个自治市镇。2)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之和不足 100，是因为未包括农林矿渔、建筑、电力及公用事业等行业；3)FIRE 部门是指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以下各表同)。

资料来源：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91

表 2 1978~2012 年东京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分布(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百分比)

	1978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09	2012

制造业	22.28	21.26	18.30	16.82	14.14	12.23	9.74	9.25	7.43
第三产业	69.32	70.62	74.40	75.82	78.55	81.44	84.78	85.13	86.84
FIRE部门	7.56	7.27	7.68	9.00	8.21	7.74	7.46	8.52	9.32

注：东京是指由 23 个中央行政区构成的东京中心区。资料来源：根据 1979 至 2013 年东京统计年鉴计算而得，<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东京都统计网。

表 1 是纽约和伦敦 20 世纪 70 到 90 年代工业(以制造业为代表)和服务业就业分布表。可以看到，纽约和伦敦的去工业化过程均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从 1977 年到 1996 年的 20 年间，纽约制造业占城市总就业的比例下降了 12.9%(从 21.9%下降至 9%)，同期伦敦制造业的就业比例下降了 13.6%(从 22%下降至 8.4%)；与此相对应，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上升了 25.6%和 15.5%；在 1977 年到 1985 年的第一个 10 年间，两个城市以金融、保险、房地产(以下简称 FIRE)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就业比重也呈上升趋势，此后趋于稳定，两个城市的就业结构均呈现出显著的去工业化特征。

表 2 是 1978~2012 年东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就业分布，东京的经济转型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但是由于东京发达的制造业，在服务业就业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去工业化特征并不明显。直到 2006 年东京制造业的就业比例才降至 10%以内，即东京的去工业化过程比纽约、伦敦晚了大约 10 年时间，相应的第三产业特别是 FIRE 部门就业比例提升的速度也要慢于纽约和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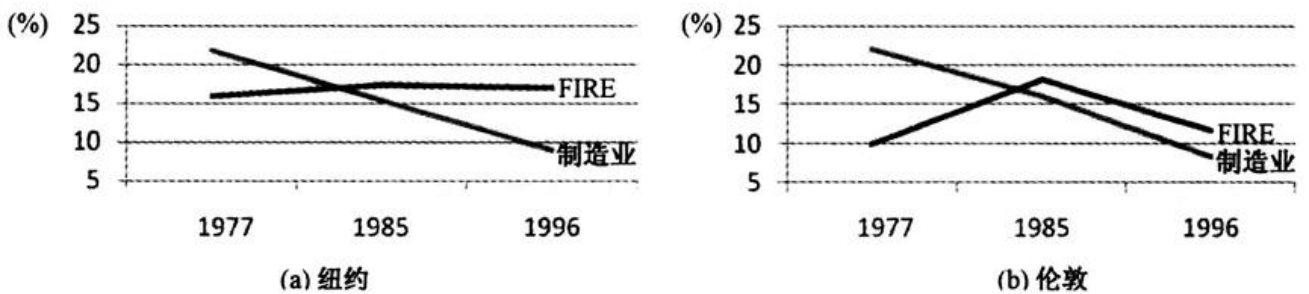


图 1 1977~1996 年纽约、伦敦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表 1 相关数据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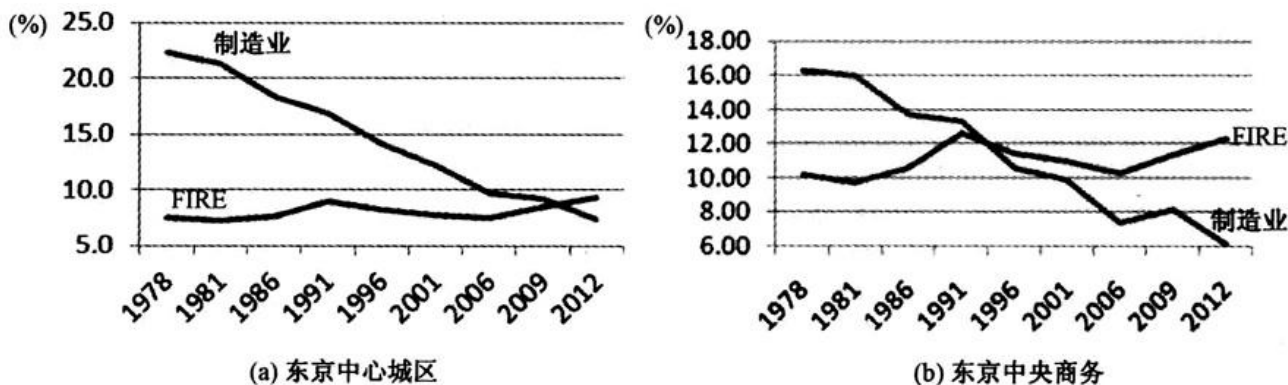


图2 1978至2012年东京中心城区和中央商务区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分布

资料来源：图2(a)根据表2数据绘制；图2(b)根据表4数据绘制。

图1(a)(b)和图2(a)是纽约、伦敦和东京在向全球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制造业和FIRE部门就业变动(图2(b)为东京中央商务区的就业变动)，尽管三大城市的去工业化进程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其均呈现出制造业下降、FIRE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上升的去工业化特征。

3.2 生产者服务业的集聚和发展在三大城市的表现

如果将纽约等城市的去工业化阶段定义为其全球城市的初级阶段，那么生产者服务向城市中央商务区的高度集聚则标志着全球城市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由于生产者服务业具有高度专业性、高知识密集性和高附加值等特点，其对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等的要求远高于制造业，而全球城市可以向生产者服务企业各类优质要素资源(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使生产者服务活动可以从各类跨国公司内部顺利地分离出来。另一方面，跨国公司规模和业务的扩张也使得公司内部的服务部门难以满足日益复杂的管理需求，形成了对生产者服务的巨大需求。在供求双方的共同作用下，生产者服务业得以在纽约等城市快速集聚，并进而提升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层级，使其发展成为具有网络节点和控制功能的全球城市。

表3 1984、1996年曼哈顿、伦敦市区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分布(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百分比)(%)

	曼哈顿		伦敦市区	
	1984	1996	1981	1999
制造	14.6	8.1	10.9	2.2
第三产业	82.3	90.5	87.3	96.6
FIRE部门	23.6	23.2	71.7	82.7

注：曼哈顿是纽约大都会区的中央商务区，伦敦市是伦敦大都会区的中央商务区。

资料来源：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202

表 3 是曼哈顿和伦敦市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分布。相比于所在的大都会地区，曼哈顿和伦敦市的生产者服务业集聚程度更高，拥有更低的制造业就业比例和更高的 FIRE 部门就业比例。其中伦敦市高度专业化于生产者服务业(FIRE 部门)。1981 年伦敦市 FIRE 部门就业在该市就业总量中的比例达到了 71.7%，1999 年更是上升至 82.7%，而制造业就业的比例则从 1981 年的 10.9%锐减至 1999 年的 2.2%。曼哈顿是纽约大都会区传统的金融服务中心，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曼哈顿 FIRE 部门就业在其就业总量中的比例一直稳定在 23%左右，而曼哈顿 FIRE 部门的就业占整个纽约大都会 FIRE 部门就业的比例高达 9000^①。

表 4 1978~2012 年东京中央商务区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分布(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百分比)(%)

	1978	1981	1986	1991	1996	2001	2006	2009	2012
制造业	16.3	16.0	13.7	13.3	10.6	9.9	7.4	8.1	6.1
第三产业	75.7	76.5	79.8	80.0	83.0	84.6	88.2	87.1	89.0
FIRE 部门	10.2	9.8	10.6	12.6	11.5	11.0	10.3	11.4	12.3

注：东京中央商务区由千代田、都中央区、港区和新宿 4 个区所组成。

资料来源：根据 1979 至 2013 年东京统计年鉴计算而得，<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东京都统计网。

表 4 是 1978 到 2012 年东京中央商务区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分布。1991 年，东京中央商务区第三产业在全部就业中的比例达到了 80%，生产者服务业(FIRE 部门)的就业比例与制造业的比例趋于接近，并在 1996 年超过制造业，标志着东京全球城市发展进入了成熟阶段。

3.3 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现状及与全球城市的差距

与纽约等全球城市相比，上海向服务业转型的时间要晚得多。表 5 为 1978~2012 年上海工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分布，从中可以看到，直到 1998 年上海服务业在总就业中的比例(41.2%)才超过工业部门(41.1%)，成为第一大产业，但远远低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纽约等城市的服务业比例(三大城市的服务业就业比例均在 70%以上)。

表 5 1978~2012 年上海工业和生产者服务业的就业分布(从业人员占城市总就业的百分比)(%)

	工业	服务业	FIRE 部门		工业	服务业	FIRE 部门
1978	39.6	21.4	0.2	2000	39.0	44.9	2.3
1980	43.6	22.1	0.2	2003	33.9	51.9	5.7

1985	51.4	25.5	0.3	2005	31.9	55.6	5.5
1990	53.9	20.5	0.5	2010	31.3	55.9	5.5
1995	48.0	35.5	1.5	2011	30.9	56.3	5.8
1998	41.1	41.2	1.8	2012	30.2	56.5	5.7

资料来源：1979~2013 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统计网 <http://www.stats-sh.gov.cn/>。

尽管如此，从就业结构的演变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上海经济正呈现出向服务型城市转型的去工业化特征(图 3)。工业行业的就业比例从 1985 年的 50% 左右下降至了 2005 年 30% 左右，20 年间下降了 20%，年均下降 1%，下降速度快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向全球城市转型的纽约等三大城市(三大城市制造业就业比例年均下降均小于 1%)。

上海的生产者服务业(FIRE 部门)就业比例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直到 2003 年，在入世后金融、外贸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上海的生产者服务的就业比例才跃升至 5.7%，但远低于起步时期的纽约等三大城市。即使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所在地的浦东新区，其 2011 年 FIRE 部门就业比例也仅为 9.7%^②，相当于东京中央商务区 1981 年的水平。

2003~2012 年 10 年间，上海的生产者服务业(FIRE 部门)就业比例始终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而同期的服务业和工业就业比例均出现了小幅变动，服务业就业比例上升了近 5%(从 51.9% 上升至 56.5%)，工业就业比例下降了 3.7%(从 33.9% 下降至 30.2%)，表明上海服务业的新增就业主要发生在生产者服务业(FIRE)以外的部门。

如果将 2003 年上海服务业就业比例超越工业部门(去工业化)作为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的开始，那么生产者服务业就业比例长达 10 年的停滞不前，表明了上海在向全球城市的转型并未发展到更高的阶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海生产者服务业的缓慢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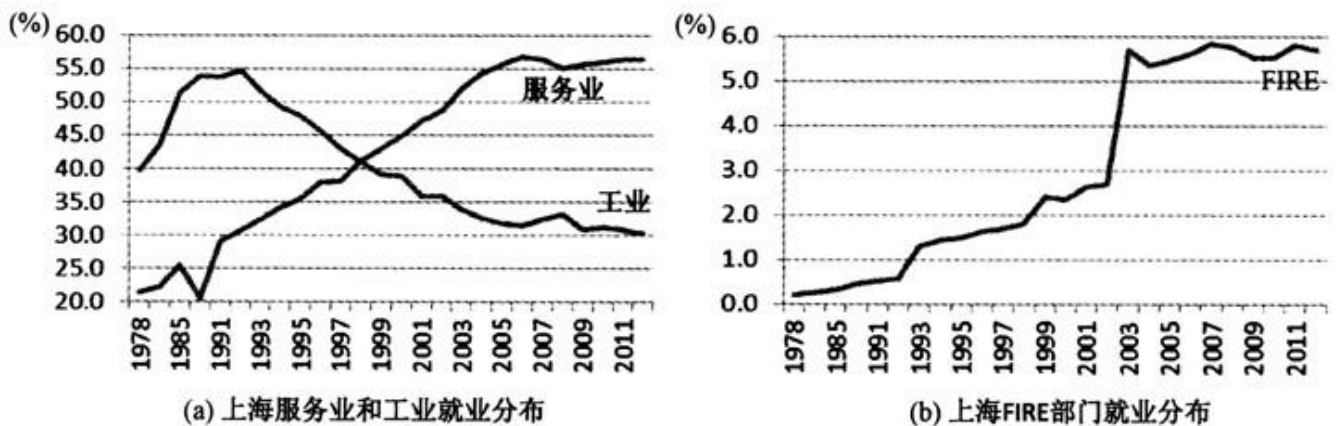


图 3 1978~2012 年上海服务业、工业及生产者服务业(FIRE 部门)就业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表 5 相关数据绘制。

4 制约上海生产者服务发展的原因分析——人口教育结构视角

生产者服务业在全球城市的集聚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和产业细分的结果，但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只是为全球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至于城市能否集聚起数量众多的、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业，能否承担起全球城市网络的节点功能，在全球经济中起到中心控制作用，还需要由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制度配套、人力资源和市场腹地等诸多因素共同决定。生产者服务业是一个对高层次劳动力资源高度依赖的行业，其能否发展、发展速度均与人力资源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人口素质角度对上海与其他全球城市进行对照分析，并寻找差距所在。

表6是1977~2007年东京大都会区人口教育结构变动表，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东京大都会人口的教育结构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大专以上学历比例从1977年的24.99%上升至2007年的52.90%，30年间实现了比例翻番；其中大学和研究生的增长更为惊人，大学及研究生人数从1977年的42万上升至2007年的359万，30年间增长了300多万，年均增长10万。在东京向全球城市转型的过程中，人口的教育结构发生了显著的提升，正是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使东京顺利地完成了去工业化及随后的服务业能级提升的过程，转型为全球城市。

表6 1977~2007年东京总人口的教育结构

	1977	1982	1987	1992	1997	2002	2007
总人口(万人)	904	940	990	1018	1030	1075	1126
大专(万人)	184	112	147	173	176	198	236
大学及以上(万人)	42	176	185	220	252	298	359
大专以上学历(%)	24.99	30.56	33.58	38.60	41.54	46.13	52.90

注：此处的东京是指东京大都会区，包括23个中央行政区、多摩地区以及岛区。

资料来源：根据1979~2013年东京统计年鉴计算而得，<http://www.toukei.metro.tokyo.jp>，東京都統計網。

表7是1982年至2010年上海市各区县大专以上学历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历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常住人口的教育程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显著提升，常住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的比例从1982年的3.5%上升至2010年的22%，28年时间里增长了17.5%，但绝对值依然较低。上海2010年大专人口比例(22%)仅相当于东京1977年的水平(25%)，相差了33年。考虑到上海有广大的市郊区县，其产业结构的演变较为缓慢，常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低。表7对2000年和2010年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上海各区县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进行了细分。分类汇总后得到的中心城区(由11个区组成)大专以上学历比例达到了30.81%，与东京1982年的水平相当，差距缩小为28年。

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国内移民)，上海本地户籍人口的增长率极为低下(某些年份甚至为负增长)，而由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每年都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从全国各地进入上海。“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常住人口2301万，比2000年“五普”时增长了628万，2010年户口所在地在外省市的常住人口为898万(本文称其为“外省市流动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551万。如果单从总量来看，外来人口几乎占据全部的新增人口，这意味着外来人口的教育结构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上海全市人口的教育

结构。人口普查中还有一类为“户口所在地为本市其他区县的外来人口”，即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均为本市，但不在同一区县的人群，2010年这一群体的人口总量为370万，本文称其为“本市流动人口”，以区别于“外省市流动人口”。

表 7 1982~2010 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和市郊区县不同人口教育结构(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¹⁾ (%)

地区	年度	全部常住人口				本市 流动人口 ⁽³⁾	外省市 流动人口 ⁽⁴⁾
		1982	1990	2000	2010	2010	2010
中心城区 ⁽²⁾	/	/	15.18	30.82	44.70	20.89	
市郊区县 ⁽²⁾	/	/	4.41	12.83	26.99	7.33	
全市	3.47	6.54	10.94	21.90	39.1	14.06	

注：(1)1982 和 1990 年的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为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 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中的 10 万人教育程度比例推算而得。(2)中心城区和市郊区县的划分以 2010 年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为标准，2010 年全市合计的大专以上人口比例 21.9%，大专以上人口比例高于 21.9%的区县为中心城区，其余为市郊区县。按各区大专以上人口比例由高到低排序，中心城区包括徐汇、长宁、静安、杨浦、卢湾、虹口、普陀、闸北、闵行、黄浦和浦东新区共 11 个区，市郊区县包括宝山、松江、嘉定、金山、奉贤、青浦区以及崇明县共 7 个区县。(3)人口普查中“户口所在地为本市其他区县的外来人口”。(4)人口普查中“户口所在地在外省市的常住人口”。

资料来源：上海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市统计年鉴》(2011)。

表 7 列出了 2010 年常住人口中不同类型人群的大专以上人口比例，其中“外省市流动人口”的大专以上人口比例仅为 14.06%，明显低于“全市常住人口”的水平(21.9%)；而“本市流动人口”的大专以上比例高达 39.1%，远高于全市整体水平。

对于上述不同人群的大专以上人口比例的差异，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本市流动人口”主要包括工作、搬迁、入学迁移等原因引发的流动，其中很大一部分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的人口流动^⑧，这类高素质人口主要向中心城区流动，其流动对上海市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生产性服务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外省市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根据“六普”相关资料，其中 90%(即接近 800 万)的外省市人口的流动原因为经商务工，这些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市郊区县的传统制造业，导致奉贤、青浦、崇明等远郊区县的外来人口比例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比例。这些外来人口的流入从整体上拉低了上海市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这部分人口的流动处于相对无序状态。这就导致了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独特的现象：由于人力资源的约束，上海的产业结构不能快速调整，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相当一部分效率低下的传统制造业没有及时淘汰，依然吸引着大量较低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

因此，从经济学视角出发，解决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过程中产业升级缓慢，生产者服务业无法快速集聚增长的现实途径是：借助一个外在的力量，使上海走出产业结构调整迟缓和人口教育结构相对低下形成的低水平循环，这个力量就是有形的政府之手。运用政府有形之手，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让一部分低效率的传统制造业淘汰或向内地城市转移，减少较低教育程度人口的无序流动。与此同时，放开对高端人才的流动限制，使有意愿的高素质人才可以较方便地留沪工作，在上海的产业结构和人口/劳动力素质提升之间建立起一个良性循环。

5 结语

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转移,上海迎来向全球城市转型的机遇。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相比,上海在服务业特别是以 FIRE 为代表的生产者服务业方面还存在显著的差距,2010 年上海服务业和 FIRE 部门的就业比例仅相当于东京 1977 年的水平,远低于纽约、伦敦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

如果将 2003 年上海第三产业就业比例首次超过工业看作为上海走向全球城市的第一步,那么 2003 年以来的 10 多年时间里,代表着城市竞争力的生产者服务业(FIRE 部门)就业比例停滞不前,则意味着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的步伐走得相当缓慢。

究其原因,常住人口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是制约上海向全球城市转型的主要阻力,而其中“外省市流动人口”是导致上海人口平均教育程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同时,在上海低教育程度的人口和低效率传统产业之间存在着一个低水平循环体系,需要借助政府有形之手打破这一低水平循环,推动产业结构的演变,减少较低教育程度人口的无序流动,从整体上提升常住人口的教育结构,为服务业的发展及能级提升提供人才资源。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编号: 12YS047)

注释:

①曼哈顿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就是纽约的金融中心,80、90 年代这一特点更加明显,曼哈顿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就业在整个纽约地区的 FIRE 就业中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86%上升至 1985 年的 90%,再上升至 1997 年的 91%。资料来源: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9.表 6.8.

②根据《浦东统计年鉴》(2012)第 247 页表 14-2 各行业从业人员(2011)计算而得。

③大致包括三类学生:(1)户籍所在地为本市的高校毕业生在本市其他区县居住并就业。(2)外省市户籍、在沪接受高等教育并在上海就业的人口。因为绝大部分在沪接受高等教育的本专科学生,在入学后将户口迁移至高校所在地的集体户口,留沪工作后再作进一步的迁移。(3)本市户籍学生在外地接受高等教育,但求学期间未将户口等迁移到学校所在地,毕业后再回沪工作。

参考文献:

[1]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M].周振华,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博尔哈,曼纽尔·卡斯泰尔.本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M].姜杰,胡艳蕾,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Mark Abrahamson. Global Citie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4]周振华.崛起中的全球城市——理论框架及中国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石光宇,孙群郎.美国全球城市形成初探[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6]沈璐.全球视角下的上海城市定位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4,(1).

[7]黄苏萍, 朱咏. 全球城市 2030 产业规划导向、发展举措及对上海的战略启示[J]. 城市规划学刊, 2011, (5).

[8]邱灵, 方创琳.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与城市发展研究[J]. 经济地理, 2012, (11).

[9]张婷麟, 孙斌栋. 全球城市的制造业企业部门布局及其启示——纽约、伦敦、东京和上海[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4).

[10]都阳, 屈小博. 城市产业发展、就业需求与人口流动: 中国与国际经验[J]. 现代城市研究, 2013, (3).

[11]陆毗, 汤茂林, 唐丽芳, 刘茂松. 世界城市区域网络中的我国巨型城市区域[J]. 现代城市研究, 2010, (9).

[12]余佳, 余佶. 巨型城市、“世界城市”与“全球城市”——兼论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层级中的位置[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2, (4).

作者简介: 蒋荷新(1967-), 女, 上海人, 博士,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区域经济。